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章学诚的生平
及其思想

「美」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章学诚的生平 及其思想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倪德卫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4765-6

I. 章… II. 倪… III. ①章学诚(1738—1801)—生平事迹 ②章学诚(1738—1801)—学术思想 IV. B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101 号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 - 1801)

Copyright © 196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07 - 188

书 名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著 者 [美] 倪德卫

译 者 杨立华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765-6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序

中国研究被划分在两个完全孤立的阵营之间,这并不是很多年前的旧事。在这两个阵营中,一部分是关注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和观察者,另一部分则是倾心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这一划分的结果造就了一个双焦点视域下的中国,其间并没有整体的理解将这两个视域结合起来。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已经为纠正这种二分的视野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上,“现在”和“过去”仍将始终分别占据我们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一个单一的画面,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vii

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我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我想探讨一些难以穷究的东西,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从而使我能够既不忽略它当下的关联,又能够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完整的一部分来理解。我发现,通过记录和阐释某个个体的思想困境(odyssey),可以最好地满足我的要求。如果做得成功,传记可以通过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但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对于中国,18世纪既是古老帝国延续的顶峰,又是近代历史苦难的开端;它既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传统最后的也是最灿烂的绽开,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巨变前夜”的情形。在章学诚的思想中,融合并重构了他的文化传统,并将它作为一个展开中的价值与问题的结构来加以揭示。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总是扭结于他能够认识到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从任何一种标准来看,这些 viii

问题都是重要的——历史的本质、学识与写作的价值以及个人洞察力的重要性。有时,章也难免在努力克服荒谬的同时陷入琐碎之中。但说到底,他既是一个知性上的巨人,也是一个明智的普通人。

导致此书的工作并非始于最近,对此,我要感谢众多与此相关的建议和指导。洪业教授于1948年在哈佛最早向我介绍了章学诚,并为此书的封面题写了赠辞,令我备感荣幸(这段赠辞引自《新唐书》,参见本书第42页)。Francis Cleaves教授于1942年开始带我学习汉语。1953年,杨联陞教授和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在哈佛指导我做关于章的博士论文,他们坚持认为我应该将它做成一个严肃的阐释工作,而非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练习。在这一点上,我想章本人(如果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赞赏他们的智慧。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福特基金、Fulbright委员会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东亚研究委员会,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重要阶段所给予的慷慨资助。

我同样深深地感谢其他的朋友。Chao-ying Fang先生阅读全文,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批评,并指示了许多重要的材料。耶鲁大学的Arthur F. Wright教授给了我太多的鼓励、指点和教诲。Wright教授负责的中国思想委员会的系列会议成了验证我对章学诚及其思想背景的阐释的重要场所。通过参与这些会议,我学到了很多。曾经提示我注意某一本书(一篇文章)或某个重要事实的朋友,还包括Robert H. Brower、Jerome Cavanaugh、Shau Wing ix Chan、David Y. Ch'en、Patrick Hanan、Kai-yu Hsu、Conrad Schirokauer、Hellmut Wilhelm以及其他一些人。我的朋友、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学讲座访学的Curtis Bennett审读了我的手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Sara H. Boyd花了数月之由来审读此书。我要对他们的耐心表示感谢。我的妻子Cornelia和孩子们为此做了另一种无可估量的付出。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章学诚本人。对他的研究使我一再触及我已经在其他著作中展开的诸多洞见。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探索其思想,揭示其个人生活——在他死后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

一切都仅仅保存在文本中。章学诚成了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真实的朋友。我曾嘲笑过他,有时也会对他不耐烦;但我对他的尊敬以及从他那儿得到的教诲,远远超过他所能想象到的。我意识到他是一个人,而我在他那儿获得的收益起码要在致谢中有所报答。

这一叙述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计划是很简要的。本书首先是一个传记。随着章学诚生活的开展,我将依其固有的发展来呈示他的思想。在他生活的某些时期,依其思想丰富性的需要,我会以传记为起点并将一章甚至数章的篇幅完全留给哲学的阐释。章学诚的兴趣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倾向于围绕某一问题,因此便有可能将这些章节集中在特定的主题上,但这也只能部分地达到。在陈述章学诚的思想时,如果逻辑上需要,我也向前追溯或向后推演,并试图始终使这些变迁清晰明确。我偶尔也会坦率地说出我对章的思想的看法。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对。他们可能会坚持认为章的问题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因此他的观念的好坏一定在我的批评范围之外。这与我的观点不同。在我看来,如果情形确实如此,那么章对于我而言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倪德卫

1965.9

目 录

序 / 1

导论 / 1

第一章 背景与教育 / 15

第二章 中举 / 28

第三章 关于典籍的著述 / 41

第四章 书院教师 / 61

第五章 文与质 / 79

第六章 史与道 / 102

第七章 史家职业 / 140

第八章 历史撰述的形上学 / 157

第九章 最后的论战 / 180

第十章 迟来的赞誉 / 199

注释 / 219

参考文献 / 240

索引 / 243

导 论

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
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

1

《庚辛间草·韩柳二先生书序》

章学诚，浙江人，一位在 18 世纪下半叶生活和写作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目录学家和史学家。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是散文，尽管他编纂或参与编纂了十几部地方志，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佚失。他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古文作者，尽管他的本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为数甚少的西方读者仍将发现其文风的灵动和有力。像许多中国文人一样，章学诚同样对哲学有着极强的兴趣。他发展出了一套颇类似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和国家观，他将这一观念植根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理论上，这一理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维柯(Vico)。在一些散文中，他表现出了汉语著作中罕有的专注和审慎的思想能力，同时，在他的思想架构中他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

在他生活的时代，章并不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相反，他不断地批评当时盛行的训诂学，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对总体叙述的偏好以及思辨的倾向，这一过时的倾向在当时不仅罕见，而且还深受怀疑。尽管他有一个小的朋友圈子，并有一些出众的、经过精心挑选的敌对者，章在其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默默无闻。然而，到了 19
2
世纪末，他开始备受瞩目，并在那些更为果敢的政治思想家中发挥了

无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即使不接受章的观点,至少也在反面受到了它们的刺激。

自从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在1902年首次阅读了章的两本流传最广的文集《文史通义》和《校仇通义》以后,章已经开始引起中国和日本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内藤让他在日本的朋友留意这些作品,并在此后不久得到了一种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以此为依据,他为章学诚编纂了一个简要的年谱。^①这发生在1920年。此后,章开始在他的故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1922年,由胡适编纂的一部更为详尽的章学诚年谱以成书的形式出版,同年还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遗文集。从那时起,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开始发表文章讨论章的著作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或者在有关中国历史和学术的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他。然而,在欧洲和美国,他仍然鲜为人知。英语世界里(在其他的西方语言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东西)关于他的最广泛的讨论是由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戴密微(Paul Demiville)撰写的一篇极为敏锐的传记文章。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不会否认,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绝大部分研究章学诚的学者都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撰述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地方志的部分。因此,章学诚开始作为一个历史方法的批评者而渐为人知;相较而言,他关于目录学或文学批评的看法则不受重视。即使在中国,他在哲学史上也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我坚信,章学诚必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 3 章学诚之所以能享有这一来得太晚的声誉,是因为在很多方面他是“现代的”。人们不断地在他那儿(在陌生的背景中)发现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而非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的观念。因此,在一种协调的视角下,我们必须牢记,他的世界与我们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中国,还完全没有受到外在世界的触动。章学诚在1789年写成了他的那些最重要的哲学文章,并且在对“法国大革命”(也许还包括法国这个国家的存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生活了12年。尽管章并不知道其他民族的世界,但是 he 对自己的世界却了如指掌。在

这个世界里,有着丰富、美丽的传统,它们充盈着他的生活。六经、伟大的史家、韩愈以及伟大的散文家,这些章学诚逐行逐句熟知的东西,他都能以一种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将它们看做同时代的东西来感受。章对他的世界的历史和文学的了解远较我们对自己世界中的一切的了解更为切近,并能够回溯到它最古老的开端,他将这一开端看做一个尚未分化的文化、政治和语言的连续体。我们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不断地看到这种意义上的连续体。

但章学诚的世界从属于时代和变迁,在检讨他的生平和思想时,我们必须知道形塑他的姿态并造就他所面对的问题的那些地形、风暴和潮流。这一背景既是政治和社会的,同时也是思想的。

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发生在 1644 年,距章的出生已将近一个世纪。在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这一征服在遭遇挫败的中国士绅中间所造成的痛楚已经平复。但在 17 世纪中叶,这一痛楚曾那样的强烈,很多士人因绝望而自尽。毫无希望的武力抵抗在不断的尝试中延续着,退隐学者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对事变的反应:黄宗羲(1610—1695 年)《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主张、王夫之(1619—1692 年)的历史思想中受伤的民族情感。^{*} 中国士人的挫折感(在那时,他们承受着让蛮族征服中国所带来的良知上的巨大煎熬)对 17 世纪新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普遍的共识。满洲人逐渐地软化士人,而非更下层的阶级——这些阶级不断地在秘密的社团里表达他们的反满情绪。汉人(尽管仍一直从属于满族人)得到了越来越多重要的政府职位,而作为汉文化庇护者的满族统治者,也成功地摆脱了他们作为野蛮人群体的身份。到了 18 世纪,政府为抵抗运动的领袖追赠荣命已经是一件可能的事了。尽管章学诚出自一个遗民抵抗特别激烈的地区,但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统治着的王朝。

满族人为此做了什么?在满族掌握中国政权以前的六个世纪里,

^{*} 《明夷待访录》已经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被翻译为英文。章学诚完全可能对王夫之的思想很着迷,但可能王夫之的著述只是由于到 19 世纪才被刊印出来,所以才逃过了被禁毁的命运。

皇位的权威和尊严逐步提高,而官员的地位逐渐削弱。很多因素都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影响。在明代(1368—1644年),宫廷从官僚阶层中分离出来。为了实施它的命令,宫廷拥有一个宦官组织(这是一个历来受儒家官僚蔑视的阶层)。那些行使古老的规谏特权的官员在朝廷上可能被当即处死、逮入监狱或鞭打拷掠(有时可能致命),有时这类惩罚会同时施加给上百人;因为在明代,官僚阶层仍保持着它固有的精神。随着王朝终结的临近,官僚阶层内部的党争开始兴起,尤其是在那些屈从宦官权势的官员与不肯屈服的官员之间,党争尤为激烈。这幅困于分歧的中国政治秩序的画卷在农民叛乱中完结。

- 5 这样,当满族人到来时,尽管他们在实际上是征服者,但在汉人的世界秩序之内,他们仍能承担作为中国弊病的改革者的角色。他们没有屈服于汉文化,他们战胜了它。他们强调这一文化中支持服从权威的那些主题,描绘了一幅完全堕落的晚明宗派主义的图画,并且鼓励好的官员不要与其他人建立共同的目标,而要管好自己的事务,在政府的政策上效忠君主。而与此同时,征服的事实依然如故。在某种意义上,满族人在与中国官僚的关系上延续了晚明宦官的角色。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集团,他们的实力依赖于其独立性和支持他们的帝王权力。这样,满族人对汉文化的接受便一方面与他们对自身独立性的维持,另一方面与他们对汉人的忠诚和顺承的恒久怀疑结合起来。这种顺承的一个耻辱的象征便是,满族人留辮子的服饰被强加给所有的汉人;而军队的建制则一直在实际上保持着满族人的垄断,直到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人不可避免地不再成为征服者,甚至不再成为武士。他们忘掉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的王孙开始轻易地成为法定的中国统治者。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毕竟只是弱小的少数民族的独立性变得充满危险。这对满族人来说将是致命的,他们的权力越来越根植于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被孤立和标识为一个异族的集团。在18世纪,满族的政策以各种方式回应这一危险。在雍正和乾隆手中,皇帝的尊严、威望和权力被前所未有地建立起来,并受到严密地保护。始于17世纪的朝廷对中国艺术和学问的支持持续下来,并且越来越兴盛。一系列钦定的宏伟编纂计划笼络了学者的兴趣

和参与,也借此鼓励学者将官职看做一种达成学术成就的机会,而非政治行动的机会。

与此同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士大夫阶层中鼓励对皇权的谦恭和尊敬。晚明被一而再地征引,用来表明如果宗派主义蔓延国家将会发生什么。雍正皇帝的《党论》一文,被命令在官办的学校里定期诵读。这一官方的意识形态首先旨在加强皇帝的权威,但它同时还有其他的用意,正如在乾隆皇帝的诏令中清楚地表现出的那样。皇帝不时对这样的倾向感动恐惧:汉人和满人在朝廷官员中组成不同的圈子,或者那些通过考试获取职位的汉族官员在太过仓促以致无法批评满族同僚时相互庇护。^{*}

事实上,皇帝的担心似乎有点过度。满族人也许的确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在章学诚的一生中,他所熟悉的人中也没有一个满族人。但是满汉关系的问题却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而且我疑心这是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状况。然而,朝廷所鼓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气候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哲学理论上,他都表现出了对国家的极大尊重(毕竟,早在章出生以前,乾隆皇帝就已经提升了皇权的地位)。朝廷对学问的支持是章学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亲口说过:朝廷的这些规划设定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旨趣。^{**}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在章学诚本人的历史哲学和学术思想中看

* 关于清代对党争的斥责的分析以及雍正皇帝的文章,参见 D. S. Nivison,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载于由 D. S. Nivison 与 A. F. Wright 编辑的 *Confucianism in Action* 一书 (Stanford, 1959 年), 第 218—232 页, 尤其是第 229 页关于乾隆对汉满竞争的担心的部分。揭示这一担心的另一文献见于《高宗实录》卷一一七三, 17a—18b 页, 时间是 1873 年。据昭梿记述, 乾隆皇帝常常用他父亲的文章《朋党论》给他的官员讲课(《啸亭杂录》, 上海, 进步书局版, 卷一, 第 10 页上、下)。

** 章学诚曾专门指出清初的“博学宏词”科和撰著《明史》的长期工作将最大数量的学者和英才汇聚在了一起。康熙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里朝廷不再有此类的行动, 所有人的兴趣都转向了科举, 其他类型的写作和学术则受到嘲弄。而“今天子右文稽古, 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 词臣多由编纂超迁, 而寒士挟依人, 亦以精于校仇辄得优馆, 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若农之逢年矣”。章学诚又补充道, 随着这一进展, 人们开始羞于谈及举业, 训诂学的风尚开始失控。《遗书》卷九, 第 36 页下一 37 页上, 《答沈在廷论学》, 1790 年。在 1782 年的《叶鹤途文集叙》一文中, 章学诚作了相同的评论。

到的那样,朝廷对党争的批评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参照。

满族政权无疑有其担心的理由。公众对满族人的排斥是一种潜在的排外情绪的部分表露,而这种情绪早在元以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满族王室对于煽动性地强调其民族起源极为敏感,到17世纪中期,政府在一系列案件中试图销毁那些在这方面有所冒犯的人的作品。1774年以后,文字狱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如果说满族人未能根除排外情绪,他们似乎也已经通过与儒家正统的联盟转移并进而驾驭了它,他们反对任何有可能对这一正统地位构成挑战的其他影响。这样一来,文字狱就和朝廷的宏伟计划——《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彻底儒家式的总结)结合了起来。章学诚似乎已经接受文字狱作为一种正常的防范措施,用来应付对合法权威的不敬。与此同时,外来的影响被削减,与欧洲的贸易被限制在广州,基督教受到压制,秘密的社团、回教徒以及其他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外在的因素和对内的移民构成了对一个汉化的、儒教的政权的挑战。尽管这一政权在18世纪分别在中亚和南方进行着大规模的扩张,但中国的姿态仍是防御性的,并且越来越内敛。在17世纪,一些作者至少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存在。但到了18世纪,像章学诚这样的人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中国以外的世界。

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和经济。随着在新的儒教国家中城市区域的增长,文字阶层的社会根基已经逐渐扩大。一种新的通俗文学——小说和戏剧变得重要;同时,新的对礼节性文字的需求也产生了,这些礼节性的文字包括诗、墓志铭和传记,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受着传统的支配。尽管通俗文学不受尊重,仍有学者为了钱而写作这类东西,而学者们为此收到的钱也比他们写礼节性的文字来得多。这一进展是关键性的,它表明这一事实:士人常常陷于窘迫之中,他们的人数已经太过庞大以至于无法被政府部门吸纳。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向官职的道路是科举系统。在整个中华帝国的后一千年中,科举在士人生活里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从幼年起便形塑了他们的教育。但是在明、清两代,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迫使文人要通过科举,即使不是为了官职,至少也是为了某种获

取资助的方式——如教其他士人的孩子如何写应试文章。士人们每三年有一次考试机会。第一个真正重要的考试——乡试在秋天举行；成功的应试者成为举人，而举人则要参加来年初春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在这一较高级别的考试中成功的人成为进士，进士要参加有皇帝出席的殿试，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测试和级别的确定。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达到顶点，而许多人都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放在备考或一而再地参加科举上面了。章学诚本人也只是在中年才成功。科举并不需要一般人以为的行政和法律上的细节知识，而是需要一种用精致的文言写作有关经学题目的技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八股文。一些不切实际的年轻人在内心里开始反抗这一荒唐的制度，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如章学诚）最终仍顺从了。^②然而，在18世纪，即使一个人通过了科举，也不能确保他会得到一个职位。除了少数高居榜首的人，极少有人立即得到任命，像章学诚的父亲那样等了十年的情况是常有的。

随着对任命的竞争的增加，公众道德渐趋卑下，贿赂成为获取、掌控和保留官职的例行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而这一困难被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了。什么是贿赂？儒家的调和观念要求官员之间以及官员与百姓之间有着和顺的关系。送礼和收礼是错的吗？皇帝本身就树立了榜样，他要求他的官员定期进“贡”来表达他们对他慷慨地赐予额外的薪俸表示感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皇帝认为这些赏赐使得他们能拒收贿赂。^③

18世纪的后半叶，官员的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曾经据有权位以增加他们中国属员的压力的满族统治者开始变得越来越奢侈；在那个世纪的后1/4的时间里，一个满族官员和珅（1750—1799年）控制了朝政和年迈的乾隆皇帝。他编织了一个遍及全国的政治同盟的网络，并利用权位积累了可与王朝匹敌的财富。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针对那些被称为和珅心腹的官员贪污行为的著名检举案，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例是1782年山东巡抚被处死。^④1799年和珅被杀，但这并没有平复已造成的破坏。腐败以及内外军事行动的巨大代价，使得到了那个世纪末，国家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官员们日甚一日的贪婪以及人口超逾限度的巨大增长，使叛乱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

这就是章学诚的最后岁月里的情况。那个世纪末内部叛乱带来的混乱对他个人产生了影响,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倾注心力最多的作品没有完成或未能出版并且随即佚失。而且,无名的学者在经济上的困窘体现在章自己的处境中。章学诚的家庭属于一个较为贫穷的士绅阶层,而且生活在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域之一——浙江。浙江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富有、繁盛的省份,为国家的其他部分提供税收和粮食,同时在艺术和学问上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繁荣。它在17世纪的军事征服中遭受了重创,而在它重获先前的地位之前,它不得不应付18世纪人口的激增。^⑤ 政府部门的败坏对于章学诚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父亲仕宦生涯几乎刚刚开始,便在耻辱中结束了,这使得他的家庭陷入了真正的贫困;他对和珅的作为的痛楚反应被记录在他自己的作品中。

如所周知,士绅阶层中较为贫困的成员是极端无保障的。作为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学者随时面临因缺乏忠诚或遇到更无耻的竞争者而丢失职位的危险,除了官职以外,他也可能通过从事实际的事务来维持作为士绅的身份。他最有保障的前景是成为衙门的师爷。事实上,这似乎也是章学诚家前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学者也可以被聘用为富有的官员家庭内的“师爷”或教师,并一直依赖于他的恩主的庇
11 护和财富。作为“师爷”,他可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写作和研究计划。围绕着一个又一个恩主的文人圈以及产生于这种情况下的合作性质的学术研究是18世纪学术的两个独特的面相。也许,这些学者的恩主只是对最大的恩主——朝廷的简单效仿。穷困的文人的第三种谋生方式是为了获得报酬或暂时的支持而写某些专门的文章,如为他的恩主故去的亲戚写传记、碑铭、家谱或编辑一本书。^{*} 易于成为合作计划的一种边缘情况是地方志的编纂,这一工作是由地方政府资助的而且会署作者自己的名字。这是章学诚经常从事的一类典型的工作,而在这方面,他自认为是个专家。

* 据说富有而且作为此类作家中非常成功的诗人袁枚,可以因一篇墓志得到1000两银子的润笔(ECCP,第955页)。

当然,无名的学者也可以选择教书。作为一个教师,如果他能执政某个地方书院,那还是不错的,但为此,他仍依赖于资助。书院是典型的新儒学的机构。在宋代,地方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阐述新儒学思想的理论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在宋、明两代,书院通常是私立的学校,也是既有政治和哲学设想的一个潜在的批评来源。专制的明王朝将这些机构看做是对危险而独立的哲学思想的鼓励。在16世纪中期,其中的很多被关闭了。17世纪初,围绕着其中一个书院的反对宦官的党派(东林党人)的失败,导致了对他们更大规模的镇压。

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满族人在对付书院上的手段比他们的前代更有效。清代所用的办法只是自始至终地资助书院。从1657年开始,清政府在全省建立书院。到了1731年,书院的学生开始可以利用政府的资助,同时,更多的书院建立起来,使得任何一个地方有前途的人都能够为准备科举而专心学习。这样一来,在清代,书院在实际上被并入了国家的教育系统,而在其中,主要的学业是学习写作八股文。在很多书院中,日常的考试不是由院长主持,而是由当地的教育专员来管理的,这种方式在1785年成为定例。但至迟到1730年代,院长由地方官员确定则已成惯例。^⑥

12

章学诚生涯的主要部分是作为一个又一个书院的教员度过的。尽管书院实际上是政府机构,但教职却不是官方的职位。一个通过向某个地方官员(有时是朋友、有时是朋友的朋友)托请而得到这一职位的人,也可能会很快地失去它。章学诚完全依靠人际关系来获得这些职位或其他的谋生方式。他的困境是典型的。学者生存在经济上的无保障使得他不得不将基于亲戚、相同阶级或科举群体的成员以及同乡(常常因方言和口音而变得非常明显)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置于首位。由这样的自然联系联结起来的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互相谋求友谊和帮助。这样,章学诚的好友或恩主常常出自浙东就不难理解了。

在宋代,新儒学一直由地方书院的师生和某些重要的政府官员之间的讲会来形塑。尽管它倡导一种向古代的道回归的政治观点,似乎